

语言

与

实践

——实践唯物主义的
语言哲学导论

Language
and
Practice

钱伟量 著

H0-05

Q 252

语言与实践

实践哲学的语言哲学导论

钱伟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8F70/07

语言与实践

——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

著者 / 钱伟量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皮书事业部

(010)85117872

责任编辑 / 范广伟

文稿编辑 / 刘利华

责任印制 / 同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0.75

字 数 / 257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49-996-4/B·140

定 价 / 2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钱伟量, 1954年8月
出生, 江苏吴江人。

本科就读于南京
大学哲学系, 硕士
和博士就读于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先后在苏州大
学、海南大学和北
京工业大学工作,

1997年获“全国普通高校百名‘两课’
优秀教师”称号。现为北京工业大学教
授, 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哲
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社会
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论文20篇, 主编
出版教材1部。代表作有: 《语言的实践
基础》、《实践的交往性和休谟怀疑主
义》、《语言的诱惑——西方哲学的语
言哲学阶段》、《道德意识的个体发生
机制》、《传统文化与道德自律》等。

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 北京市教
委课题2项。其中2003年作为课题负责人承
担了北京市教委课题“中国传统语言哲
学问题研究”, 该课题正在研究中。

本书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批判地梳理西方语言哲学，指出了西方各派语言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从语言的基础、本质与起源、结构与功能和意义的表达与理解等方面探讨了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基本构架和主要问题。

目 录

导 言 “语言的转向”与“实践的转向”	1
一、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2
二、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	7
三、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与实践的唯物主义	58
第一章 语言的意指性与系统性	62
一、符号与语言符号	63
1. 信号、符号和语言	63
2. 符号分类与符号功能	67
二、语言符号的意指性	74
1. 能指与所指	75
2. 意指关系的任意性与非任意性	85
3. 语义三角	92
三、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99
1. 有意义的切分	100
2. 有规则的组合	105
3. 有限手段的无限生成	115

2 语言与实践

第二章 意义理论批判	126
一、指称论	130
1. 弗雷格：涵义和指称	131
2. 罗素：摹状词理论	135
3. 维特根斯坦：图像论	140
4. 逻辑经验主义：语言的可证实性	143
5. 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因果指称论	145
二、观念论	150
1. 认知观念论	151
2. 表现论	156
3. 意向论	161
三、形式主义语义学	172
1. 形式主义语义学的思想背景	172
2. 卡尔纳普和塔尔斯基的逻辑语义学	174
3. 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语义理论	176
四、语用学的意义理论	185
1. 行为主义与实用主义	186
2.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192
3. 言语行为理论	193
4. 符号互动理论	200
 第三章 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观	208
一、实践的交往性与交往实践	208
1. 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208
2. 实践的二重性特征	217
3. 通讯、传播与交往	228
4. 实物交往与符号交往	237

目 录 3

二、语言的本质与起源	242
1. 对抽象语言观的批判	242
2. 语言的本质	252
3. 语言的起源	266
三、语言的结构与功能	279
1. 交往实践与言语行为结构	279
2. 语言交往活动与交往实践的同构性	285
3. 语言的功能	287
四、意义的表达与理解	293
1. 意义的构成	293
2. 可说与不可说	297
3. 理解如何可能?	302
 主要参考书目	317
 主要人名对照表	323
 后记	328

导言 “语言的转向”与 “实践的转向”

语言哲学是当代哲学的主题，这对于早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就经历了“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当代西方哲学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正如利科（Paul Ricoeur）在 1978 年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企图涉及一切表明过去五六十年间哲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的研究，就不得不涉及我们时代的几乎全部哲学成果。因为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①但是，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语言哲学仍是一个涉足未深的领域，因为以“革命的实践”（“行”）为首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语言表达（“言”）的意义为主要旨趣的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毕竟属于 20 世纪世界哲学发展的两大不同趋势和传统。然而，语言问题并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格格不入，因为“言”与“行”是不可割裂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对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持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观的态度。恰恰相反，正当西方各派语言哲学在矛盾和困境中寻求出路的时候，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论才能为当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指出方向。同时，实践哲学对语言哲学的介入，必将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第 337 页，商务印书馆，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2 语言与实践

自身的充实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性的影响。

一 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西方哲学转向语言哲学是合乎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这里所说“语言哲学”，不是指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指一种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对应的哲学态度或哲学思维方式。换言之，这里所说的语言哲学家不仅在研究语言问题，而且把语言问题变成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把语言哲学变成“第一哲学”，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达到对思维和存在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把握。哲学家最初关心的是事物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即世界的存在和本原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是以“作为存在的存在”为对象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本体论阶段。事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呢？是原子，还是理念？是静止不动的，还是流变不居的？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哲学家们向世人宣告了关于世界存在和本原的“真理”，但后人在编撰他们的学说和观点时却常常将这些资料称做《意见录》。显然，哲学家们对自己的“洞穴假相”缺乏自知，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说明世界本原的问题时，已经受到他们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角度的限制，因而，他们所说的“事物本身”其实只是他们所“认识到的事物”。人们终于意识到，如果不首先搞清人的认识的本质问题，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就是无法解答的。于是，哲学从向外的探索转向内在的反思，笛卡儿等人开创的近代认识论哲学便取代古代本体论哲学而成为“第一哲学”。“第一哲学”的对象在笛卡儿那里已经不是“存在”，而是“我思”，或者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批判”。这就是近代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认识论哲学不仅以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为其中心问题，而且试图在人的认

识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上重建本体论，即建立一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导论”和“三批判”为建立这种“未来的形而上学”鸣锣开道，经验主义者试图在“感觉材料”或“经验之流”的基础上重建世界本体，黑格尔试图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本体，而叔本华却把世界的本原建立在“意志”的基础之上。近代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家由于对自己的“市场假相”缺乏自知，因而又再现了古代本体论形而上学所遇到的同样的内在矛盾：认识的本质以及在认识论框架中的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经验，还是理念？是理性的观念，还是非理性的直觉或意志？哲学家们没有看到，他们在说明认识和意识的本质以及人所认识到的世界时，已经受到他们自己的表述角度和表述方式的制约。他们所说的所谓“认识的本质”和“世界的本原”，实际只是他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认识的本质和世界的本原的表达。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如果哲学不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都是无法解答的。因此，正如“理性的批判”成为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口号一样，“语言的批判”成为现代语言哲学转向的口号。当代西方各派哲学，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纷纷转向语言哲学，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意义和理解以及语言行为等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中心。哲学家们甚至试图将语言本体化，以便在语言哲学的框架内恢复传统的本体论问题。例如，奎因提出的“本体论的承诺”，就是把“何物存在”的问题变成关于“何物存在”问题得以成立的合法的语言形式和条件的问题；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则实现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公开宣布“语言是存在之家”，“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结构主义的形式语言学一方面强调语言返回自身，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德里达的名言“本文之外无他物”就精练地概括了这一结构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这种形式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推广到

4 语言与实践

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和精神分析等各个领域之中，使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实际上获得了一种“第一哲学”的地位。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语言构成了全部文化现象和全部社会生活形式的原型。

西方哲学发展经过这三个阶段，在一定程度应验了高尔吉亚以怀疑论的口气说的三句话：“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①从表面上看，这条发展线索简直可以说是哲学的一种堕落：哲学从对事物本身的思考退到对事物的认识的思考，再退到对认识的表述的思考。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表面上的后退恰恰反映了哲学思维的一种深化。因为哲学的思考是一种理论的反思，不同于“实践的智慧”，不是对事物的直接体认。因此，哲学思考只有从与事物的直接统一中分离出来，并与认知对象保持一段距离时，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和理解才更为深刻。当然，这种与事物“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指脱离实际的玄思，而是指从认知者自己与对象之间的主客体的相互关联中反思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对主体自身的认识、语言和实践等问题的思考越充分，对事物本身的思考也就越深刻。所以，当代西方哲学转向语言哲学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哲学的堕落，倒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反思的发展规律（见图1）。

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的“语言的转向”以及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三个阶段的总结，在许多当代哲学家那里都有过大同小异的表述^②，但对于这一现象的评价则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两次转向、三个阶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6~5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1版。

② 参见徐友渔著：《“哥白尼式”的革命》，第1~6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3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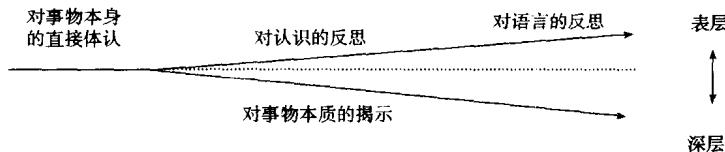


图 1

段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另一些人对此明确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语言的转向”与其说是哲学中的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哲学的蜕化与堕落，因为它使当代哲学变成沉醉于咬文嚼字、琐屑争论的新经院哲学；还有一些人则仅仅是对这一进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表示怀疑。例如徐友渔先生对“语言的转向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哲学的发展不能放到单纯的因果关系中去说明，“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巨人的创造”。他的结论是：“对于语言的转向，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它，研究它，倒不必去管它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①我不赞成这种过分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毕竟涉及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包括思想史）的重大问题。徐先生对“语言的转向”不置可否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蕴涵着对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的否定，好像历史只是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堆积。由于徐先生的论据来自罗蒂，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罗蒂的观点。罗蒂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样式”，“它在某一时期专注于一个话题而非另一个话题，不是由于论证的需要，而是由于发生于谈话中其他领域的种种事物（新科学，法国大革命，现代小说）的结果，或提出了新事物的个别天才人物（黑格尔、马克思、弗雷格、弗洛依

^① 参见徐友渔著：《“哥白尼式”的革命》，第 22, 33, 42 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年 3 月第 1 版。

6 语言与实践

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的创造，甚而或许是若干这类力量合成的结果。”因此他宁可用“有趣的哲学变化”代替“哲学进步”这种说法，并根据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学说告诫我们要抵制那种诱惑，即“认为新的问题是正确被看待的老的问题”。^①这就是说要抵制认为哲学发展有其合理性的诱惑。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历史事件的出现、思想史上的主题转换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非单一原因不等于没有原因，更不能由此得出历史（包括思想史）没有客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结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虽然指出科学史的发展包含了许多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认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否则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发展这种看法就不再有普遍必然的意义，而只是库恩个人的一种“有趣的”意见而已；第二，思想史的客观趋势关键不取决于一种思想或主题的提出，而在于一种思想或主题何以能够得到广泛和持久的流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启发在于：物种的进化不是某些生物个体选择的结果，而是环境对个体不定向变异的选择的结果。思想家们尽可以提出自己各种各样的“有趣的”见解，但思想史的主题转移和发展趋势绝不是思想家个人的选择和创造就能决定的，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这是不以任何“思想巨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还想“重视”和“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的话，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罗列语言哲学家的各种“有趣的”意见，而是要努力揭示这一转向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趋势。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握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并理解当代语言哲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①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231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应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发展的。尽管相对于传统的“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当代语言哲学家的形象显得十分渺小，他们或者像一些满足于语言分析和治疗的工匠，或者像一些咬文嚼字的诗人。然而，人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不仅容忍了这些“渺小的”哲学家，而且居然使这种满足于“琐屑言谈”的风气星火燎原、蓬勃勃勃地发展起来，这绝不是时代精神偶然的错误。

二 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

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有三条基本的线索，沿着这三条线索，我们就可以大致把握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语言哲学发展的三条线索顺应了我们时代发展的三大需求：首先是工业时代向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过渡对符号逻辑发展的要求；其次是技术的进步在极大地满足人类感官的同时给人类带来了心灵上的失落感，因而重新唤起人们对诗意地生存的渴求；最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发生的跨民族、跨种族的文化交流对发展一种超越民族语言界限的普通语言学和文化符号学的需求。

语言分析哲学传统

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第一条线索就是语言分析哲学的传统。从近代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分析哲学的过程中首先经历了一次“逻辑学的转向”，这种哲学内部的逻辑学转向是与近现代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它不自觉地顺应了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要求。休谟的怀疑主义摧毁了经验论的迷梦，因为经验归纳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的知识。显然，要获得客观的知识，仅仅局限于经验领域之中是不可能的。但是，自

然科学提供的客观知识及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辉煌效用却又是有目共睹的。为避免陷入唯我论和怀疑论，康德试图将经验论与唯理论加以调和，以证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由经验的质料和数学、逻辑的先验形式综合而成的。赋予这种知识以客观性的不是经验的质料，而是先天的数学和逻辑学的形式。黑格尔不满意康德的调和与折中，决心彻底清除康德学说中的经验主义的残余观念，使客观的知识完全奠定在逻辑的基础之上，并将这种逻辑学上升为本体论，这就是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统一”。在近代认识论传统中，知识的来源有三种：先天的理性直觉、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和感觉经验，唯理论坚持前两个来源，经验论坚持最后一个来源。黑格尔既批判了经验论，又批判了直觉主义，从而将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地位突显出来，这就是作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哲学的逻辑学”^①。他说：“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因此逻辑学就与形而上学合流了。”^② 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是纯粹的逻辑学，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仅仅是“应用的逻辑学”^③。黑格尔哲学是西方哲学“逻辑学转向”的开端。与此相应的是，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出世界的普遍联系，那么，关于世界的总联系的“科学之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④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66年2月第1版。

② 黑格尔：《小逻辑》，第7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

③ 黑格尔：《小逻辑》，第8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

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 19世纪后半期，与经验主义和实证科学的传统从英语国家向德语和法语国家和地区的转移同时，欧洲大陆的思辨哲学也开始向英语国家和地区转移。近代哲学的两大传统的交叉换位，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思辨的逻辑学向逻辑经验主义的转变，从而使这种“逻辑学转向”也蔓延到英语国家和地区。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现代分析哲学是在批判和攻击黑格尔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在“逻辑学转向”的大方向上他们却是一脉相承的。作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弗雷格将逻辑学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和中心。弗雷格的追随者罗素则说：“只要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逻辑问题。”^② 石里克认为哲学仅仅是一种逻辑分析的活动，他说：“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③ 卡尔纳普说：我们愿意“使用科学逻辑这个名称来替代那些被人们称为哲学的、不可救药的问题的混合物。”^④ 他还指出，当形而上学被归入抒情诗的领域，心理学被归入经验科学之后，哲学中惟一保留的就是逻辑学。因此，“哲学惟一正当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⑤ 可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逻辑学的转向”，否则，黑格尔、恩格斯、罗素、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哲学就是逻辑学”的口号就是十分奇怪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

②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卷，第30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1月第1版。

③ 同注②，第414页。

④ 同注②，第461页。

⑤ 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第22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2版。